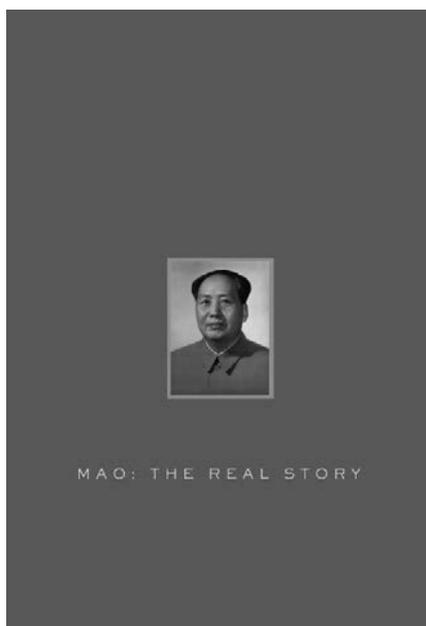


# 新版毛澤東傳記中的俄國史料

## ——評 Alexander V. Pantsov with Steven I. Levine, *Mao: The Real Story*

● 梁加農

潘佐夫的《毛傳》分為「學習者」、「革命者」、「獨裁者」三篇，依次敘述毛澤東的一生。《毛傳》以俄國史料凸顯了毛澤東崛起、建國的蘇聯背景以及斯大林的決定性影響，從新的視角考察了相關問題。



Alexander V. Pantsov with Steven I. Levine, *Mao: The Real Stor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2).

2007年，原籍俄國、現為美國俄亥俄州首都大學(Capital University)歷史教授的潘佐夫(Alexander V. Pantsov)以俄文出版的《毛澤東》

(*Мао Цзэ́дун*)<sup>①</sup>一書，包含了許多第一次公開發表的俄羅斯社會和政治史國家檔案館(РГАСПИ)的資料。該館藏有1917年以來蘇共中央及其一手主導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檔案，有關中國共產黨的檔案有3,328卷檔，包括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林彪、鄧小平、王明等領導人的個人卷宗，尤其以1919至1943年第三共產國際(Comintern)有關中共的檔案最為豐富。2012年，經梁思文(Steven I. Levine)協助編譯，該書出版了英文版《毛澤東：真實的故事》(*Mao: The Real Story*，以下簡稱《毛傳》，引用只註頁碼)。2015年5月，台灣出版了《毛傳》繁體中文譯本《毛澤東：真實的故事》(以下簡稱中譯本)<sup>②</sup>。同年8月，中國大陸出版了以俄文版為底本、英文版為補充的簡體中文譯本《毛澤東傳》<sup>③</sup>，據說個別敏感內容有所刪節，筆者尚未見到此書，姑不置論。

與俄文版比較，《毛傳》整體篇幅少了一些，主要是省略了俄文

版中註引的一些檔案資料。俄文版共三十二章，分為八篇，每篇四章；八篇依次是「潤澤東方」、「幹甚麼？」、「民族主義還是社會主義」、「槍桿子裏面出政權」、「領袖的誕生」、「形式與結果」、「從斯大林化到毛澤東化」、「最後十年」。《毛傳》保留了俄文版的三十二章，另外新加了四章，即「紅色麥加朝聖」、「朝鮮戰爭」、「海瑞罷官」和「紅衛兵的悲劇」。全書共三十六章，合為三篇：「學習者」、「革命者」、「獨裁者」，依次敘述毛澤東的一生。「學習者」用了九章敘述毛從1893年在韶山出生到1920年代初加入中共的早年經歷；「革命者」有十四章，是全書的重心，講解了毛從1923年遵從共產國際指示加入國民黨，登上中國政治舞台，到1949年打倒國民黨，「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故事；「獨裁者」從1949年「紅色麥加朝聖」到1976年「赤皇駕崩」共十三章，其中最後五章關於文革時期。

《毛傳》出版後得到高度評價。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教授丁學良謂之「最有史料價值的毛澤東傳記」<sup>④</sup>。英國阿伯里斯特威斯大學(Aberystwyth University)國際政治學講師拉欽科(Sergey Radchenko)也視新史料為《毛傳》最大看點，認為有關毛1920至1930年代成為中共領袖的敘述詳實新穎<sup>⑤</sup>。筆者認為，《毛傳》以俄國史料凸顯了毛澤東崛起、建國的蘇聯背景以及斯大林的決定性影響，從新的視角考察了相關問題，對現代中國的研究具有重要價值。下文對其中的一些新史料及其引申的問題略作討論，

以豐富我們對《毛傳》學術價值的認識。

## 一 「延安整風」問題

一般認為，毛澤東個人崇拜是1940年代延安整風時由劉少奇首倡，及至1960年代復經林彪鼓吹而於文革中達到高潮。在這一問題上，《毛傳》提供了一段「史前史」，那就是早在1930年代中期，斯大林通過長期觀察、決定把毛作為中共領袖之後，為了把中共轉化為斯大林式的以領袖為核心的組織，開始製造毛的個人崇拜、「君師合一」以及整肅黨內反對派——就算沒有也要製造出反對派來。1938年蘇聯就宣傳毛是具有光輝理論的「英明的戰術家和戰略家」；同年斯諾(Edgar Snow)出版的《西行漫記》(*Red Star Over China*)中有關毛的部分經過精心剪裁後出版了俄文本(頁323-24)。《毛傳》認為，中共從成立到發展再到奪取全國政權，最關鍵之處都是依靠蘇聯的支持和聽命於斯大林的共產國際；而「毛澤東是斯大林忠實的追隨者，按捺着性子向他的主子一再表示效忠，直到斯大林過世之後，才敢脫離蘇聯模式」(頁4)。

《毛傳》的基本結論與過去許多學者強調毛澤東的政治獨立性和思想原創性形成對照。如潘佐夫指出，毛澤東發起延安整風，清除黨內以王明、博古為代表的留蘇派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確立他的中共領袖地位，事前都得到了斯大林的批准；他認為，沒有斯大林的同

《毛傳》認為，中共從成立到發展再到奪取全國政權，最關鍵之處都是依靠蘇聯的支持和聽命於斯大林的共產國際，與過去許多學者強調毛澤東的政治獨立性和思想原創性形成對照。

意，毛不可能發起整肅王明的運動（頁333）。這與高華的名著《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以下簡稱《紅太陽》）的分析完全不同。高華對整風的時機曾有一段生動的敘述<sup>⑥</sup>：

1941年6月22日，蘇德戰爭爆發，毛澤東行動的時機終於到來了。現在斯大林已陷於戰爭的泥沼而無暇東顧，莫斯科鞭長莫及……毛澤東將立即採取行動，對不可一世的斯大林實行遠交近攻：鏟除其在中共黨內的門徒，而仍將斯大林奉為門神。

而據《毛傳》披露的檔案材料，1939年末至1940年初，共產國際就通過口頭和電報向毛澤東轉達了對將要召開的中共七大的人事建議。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總書記季米特洛夫（Georgi Dimitrov）在1940年3月17日致電毛澤東：「你需要認真全面地考慮，自己決定採取果斷的措施完成之。」（頁333）共產國際組織部給季氏的備忘錄則寫道：

必須記住，王明在中共老幹部中沒有威信，他是（1931年1月）四中全會上在米夫（Pavel Mif）的影響下被提拔到黨的領導崗位的。建議中共領導不要將王明留在黨的領導崗位上。（頁333）

這份備忘錄還指明不要康生、鄧發、關向應、楊尚昆進政治局或書記處；博古、陳昌浩、張浩、孔原不進中央委員會；在二十六名建議提拔的幹部中，又特別提出林彪、賀龍、劉伯承、聶榮臻、蕭克、徐

向前、陳光、鄧小平和葉劍英（頁333-34）。由此可見，1945年延安整風完成後中共七大的人事布局，之前就已有共產國際定下的腹案。其中康生因毛澤東後來致電季氏說他是「可靠的」而得以進入政治局（頁334）。

《毛傳》披露的檔案還顯示，在蘇德戰爭爆發、德軍兵鋒直指莫斯科的危急關頭，斯大林並沒有「無暇東顧」。為了鞏固毛澤東的黨內地位，繼1940年3月由周恩來自蘇聯帶回30萬美元給中共中央後，1941年7月3日斯大林又決定給中共100萬美元的巨款（頁334）。《毛傳》說，蘇聯政府幫助中國搞革命花了幾千萬美元（頁352）。其實，這也是依樣畫葫蘆。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的成功，德國政府秘密資助流亡西歐的列寧2,600萬馬克曾起過關鍵作用<sup>⑦</sup>。

高華比1955年出生的潘佐夫年長一歲，是中國一流的歷史學家。但畢業於國立莫斯科大學的潘佐夫具有掌握俄國檔案的非對稱性優勢。在中國核心政治檔案嚴格保密的制度下，《紅太陽》的史料來源，除了官方出版的文集、年譜外，也有不少可靠性較低的回憶資料，同時缺乏更重要的俄國原始資料，高華也自言「沒有機會去莫斯科收集有關資料」<sup>⑧</sup>。「老延安」何方曾結合自身經歷，批評高著「沒能完全從幾十年來關於延安整風的主流宣傳和相關資料中『獨立』出來」<sup>⑨</sup>。毛澤東自己對延安整風的解釋，即「整風實際上是整蘇聯的風，是批判斯大林和第三國際的錯誤」<sup>⑩</sup>，在中國曾很有影響，高華也是基本

潘佐夫指出，毛澤東發起延安整風，清除黨內以王明、博古為代表的留蘇派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確立他的中共領袖地位，事前都得到了斯大林的批准。此外，1945年延安整風完成後中共七大的人事布局，之前就已有共產國際定下的腹案。

認同的。但這一解釋出在斯大林死後、蘇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錯誤的1956年，是否言過其實，甚至言行相反，從《毛傳》披露的檔案看，仍是一個值得進一步探討的學術課題。可惜高華過早地離開了人間，他曾計劃寫作的《紅太陽》修訂版，一如《紅樓夢》沒有寫完，給中文讀者留下了遺憾。延安整風前後，毛澤東獨自掌控與莫斯科的電訊聯繫；1946年撤離延安前，毛親自監督有關人員燒毀了全部往來電報記錄<sup>⑪</sup>。《毛傳》披露的上述涉及敏感的中央人事的檔案，過去完全不為人知，顯示延安整風的幕後另有乾坤（尤其斯大林的真實角色），是很值得重視的史料。

## 二 「裏通外國」問題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共中央在「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問題上發生分歧，劉少奇等與毛澤東意見相左，並引發了建國後第一次重大黨內鬥爭——「高崗事件」。官方對此的解釋是高崗分裂黨，攻擊劉少奇，陰謀篡權；鄧小平則具體地說高崗「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於放手這麼搞」<sup>⑫</sup>。原高崗秘書、後為高崗「管教組長」的趙家梁在2008年出版的回憶著述中披露了許多內情，修正了官方的解釋，認為高崗首先得到毛澤東的支持，才敢於放手搞；「高崗事件」是毛劉鬥爭的反映<sup>⑬</sup>。而《毛傳》則進一步提供了「高崗事件」的國際背景，即斯大林與毛澤東在「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上的分歧，不

僅披露了有關史料，也引出了新的問題——劉少奇是否「裏通外國」。

《毛傳》指出，「新民主主義」本來就源自斯大林。1937年11月，斯大林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王明和康生談話，提出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新策略，那就是表面上其他國家的共產黨要與蘇聯拉開距離，不講社會主義，改為建立「人民民主」的新社會；不僅要迷惑中國知識份子和資產階級，而且要迷惑西方，尤其是爭取美國在國共鬥爭中保持中立（頁332）。斯大林11月11日發給中共中央關於「統一戰線」的指示電報，也體現了這一新思維（頁319）。後來蘇聯領導人多番向西方人士說中共不是真正的共產黨（頁345）、毛澤東在延安對西方記者及美軍觀察組發表的「民主」言論（頁320、344-45），都是出於這一策略。

《毛傳》提出，斯大林出於地緣政治的考慮，希望新中國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不要急於實行社會主義。1952年10月，斯大林在蘇共十九大期間會見與會的中共代表團團長劉少奇，表示堅決反對毛澤東要在十至十五年內實現農業合作化的意見（頁391）。劉回國後向毛和中央轉達了斯大林的意見，但毛並不準備按斯大林的意見辦。斯大林還曾表示，在新政權中安排民主黨派領導人的問題上，劉等人的意見是正確的（頁394）。

在這次「路線鬥爭」中，高崗雖然站在毛澤東一邊，但卻被毛拋棄，也被斯大林拋棄。《毛傳》引證學界周知的蘇聯駐中國專家總負責人科瓦廖夫（Ivan Kovalev）和蘇

《毛傳》提供了「高崗事件」的國際背景，即斯大林與毛澤東在「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上的分歧。斯大林出於地緣政治的考慮，希望新中國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不要急於實行社會主義。

《毛傳》引證斯大林死後叛逃到西方的前蘇聯情報部門官員德日阿賓的回憶說，劉少奇早在1930年代就開始為蘇聯情報部門工作；1940年代繼續向斯大林提供秘密情報，不過，這一回憶沒有其他文獻佐證。

共中央總書記赫魯曉夫(Nikita S. Khrushchev)的回憶，指斯大林把高崗私下給他的有關劉少奇等人的「小報告」轉交給了毛澤東，並分析了斯大林之所以這樣做的原因，其中最後一條是：斯大林為了鞏固劉少奇這個中共黨內僅次於毛的第二號人物、他更重要的線人的地位。《毛傳》引證斯大林死後叛逃到西方的前蘇聯情報部門官員德日阿賓(Petr Deriabin)的回憶說，劉少奇早在1930年代在莫斯科擔任中華全國總工會駐國際赤色工會代表時，就開始為蘇聯情報部門工作；1940年代繼續向斯大林提供秘密情報(頁395)⑭，「裏通外國」的性質比高崗更甚。不過，這一回憶沒有其他文獻佐證，潘佐夫在作出上述判斷前謹慎地加上了「如果德氏的回憶可靠的話」這個條件句。2015年7月，他在接受英國廣播公司(BBC)採訪時說，如果有證據的話，只能在「克格勃」(KGB，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檔案中查找，但是這部分檔案目前尚未公開⑮。

值得注意的是，《毛傳》中引用了一件與上述判斷互相衝突的檔案，那就是1938年蘇聯大清洗時整肅共產國際幹部，斯大林「一度把周恩來、劉少奇、康生、陳雲、李立三、張聞天、王稼祥、任弼時、鄧發、吳玉章、董必武等，都列入黑名單」，計劃把他們殺掉(頁426)，劉也在其中，但沒有王明，也沒有毛澤東。1930至1931年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米夫就是在大清洗中被處決的。而據德氏說，吸收劉做情報工作時，斯大林親自向他保證人身安全⑯。

歷史上，蘇聯對華情報工作範圍廣、隱蔽深。1933年共產國際派往江西中央蘇區的軍事顧問李德(Otto Braun)，公開的組織關係在上海的共產國際遠東局，但也是秘密情報人員(頁268-69)，屬蘇聯工農紅軍總參謀部第四局(情報局)，該局在上海設有秘密電台。著名的蘇聯間諜佐爾格(Richard Sorge)1930年代也在上海。1932年，共產國際曾通過第四局經佐爾格向在上海的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轉去10,000美元緊急財政援助⑰；1937年訪問過延安的美國女記者史沫特萊(Agnes Smedly)是佐爾格的情人之一(頁306)。1940年代，蘇聯駐華大使潘友新(Alexander Panyushkin)、羅申(Nikolai Roshchin)都是蘇聯情報部門的高級官員。1949年以後，羅申又接着擔任了蘇聯駐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首任大使。有材料說，1950年在毛澤東北京住所發現了蘇聯特工安裝的竊聽器(頁400)。此外，1942至1949年蘇聯派往中國擔任毛澤東醫生的阿洛夫(Andrei Orlov)也負有收集情報的任務，他在1949年12月毛澤東訪問蘇聯前夕，向斯大林詳細密報了毛的個性及對蘇態度(頁367)⑱。

具體到德氏的回憶，另一個疑點是，1968年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通過的中央專案組〈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對劉羅織罪名，卻沒有「裏通外國」的材料⑲。在當年反對以赫魯曉夫為代表的蘇聯現代修正主義的背景下，劉少奇被公開指責為「中國的赫魯曉夫」，如有任何通蘇的嫌疑，毛澤東決不會輕易放過。

### 三 文革及有關問題

負責劉少奇專案的政治局常委周恩來、康生<sup>②</sup>在1920至1940年代曾是中共情報部門的最高負責人，與蘇聯交往很深，也完全了解中共從1921年成立直到1943年共產國際解散，都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下級服從上級」，黨員中曾為蘇聯情報部門工作的為數不少，不會遺忘劉少奇歷史上與蘇聯來往的嫌疑。

此外，毛澤東猜疑心重，警惕性高。早在1953年就曾密令高崗調查劉少奇1929年在奉天被捕後的表現，查閱了有關檔案<sup>③</sup>。1960年代初中蘇分裂後，歷史上與蘇聯有過關係的幹部中有不少都被懷疑有「裏通外國」的問題而被關押審查，包括毛的歷任俄文翻譯師哲、閻明復、李越然。1964年1月28日，毛澤東閱總參謀部情報部（總參二部）〈阿爾巴尼亞破獲一叛國案簡況〉後批示：「蕭華、徐子榮同志：此件值得注意。我國軍隊、公安部隊、機關中和社會上是否有被蘇修布置的人，請你們研究一下。至於蔣匪幫是否有其布置的人，則更值得注意。謝富治同志如未外出，此件應請他看一下。」<sup>④</sup>謝富治時任公安部部長，蕭華是中央軍委總政治部主任。1966年12月設立的具體辦理劉少奇專案的「中央辦公廳丙組」，謝富治任組長，蕭華是三個組員之一<sup>⑤</sup>，辦案時曾提出劉同斯大林的「特務關係」問題，但查無實據<sup>⑥</sup>。

《毛傳》運用俄國史料提供了「高崗事件」的蘇聯背景並引申出關於劉少奇的問題，但從以上分析可見，中國方面沒有劉「裏通外國」的材料。德氏的回憶，目前似應視為孤證，錄之待考。

《毛傳》關於文革時期的五章比較平淡，但循着之前潘佐夫對毛澤東與斯大林關係的敘述線索，毛文革時的某些言行似乎可以得到新解。《毛傳》最後引用了1966年7月8日毛在武漢寫給江青、挑明發動文革心迹的那封著名的信中的一段話：

總覺得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我就變成這樣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義，在我身上有些虎氣，是為主，也有些猴氣，是為次。（頁577）

讀罷《毛傳》，可以知道毛有這樣的感覺主要是在1953年斯大林死後。這封信中還有《毛傳》沒有引用的一句話：「我就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當了共產黨的鍾馗了。」<sup>⑦</sup>此前，共產黨的「鍾馗」、「老虎」是斯大林，「斯大林是唯一能讓毛感到畏懼的活人」<sup>⑧</sup>。毛在1948至1949年發往莫斯科的電報中，恭敬地稱斯大林為「大老闆」（頁356、357）。《毛傳》說，1949年12月，毛澤東第一次去莫斯科見斯大林，非常緊張，甚至覺得有性命之虞（頁368）。此說是依據全程陪同毛訪蘇的科瓦廖夫的回憶。另一陪同者師哲則說，毛去見斯大林，並不害怕<sup>⑨</sup>。毛為了維護自己在黨內的崇高威信，高級幹部中只帶了他的政治秘書（對外以教授的名義）陳伯達隨行。到蘇與斯大林簡短地見面後，就被攔在一邊一個月。斯大林就是要以此告誡毛：我才是共產黨的老大，你算老幾？（頁371）等斯大林

《毛傳》說1949年毛澤東第一次去莫斯科見斯大林，非常緊張，甚至覺得有性命之虞。此說是依據全程陪同毛訪蘇的科瓦廖夫的回憶。另一陪同者師哲則說，毛去見斯大林，並不害怕。

1960年代初中蘇分裂後，蘇聯獲得的有關毛澤東的一手材料很少，《毛傳》有關晚年毛澤東的敘述是最為薄弱的部分。其對文革的解釋——文革不僅是毛最後一次權力鬥爭，更是其創造一個新的理想社會的認真努力，也不新鮮。

自覺有點欺人太甚，加之外傳英國將承認新中國而轉變態度後，毛才叫總理兼外交部長周恩來到莫斯科（頁372）。

毛澤東這封信中還說，「在重大問題上，違心地同意別人，在我一生還是第一次」<sup>28</sup>，他指的是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即所謂「政變經」）。而從《毛傳》看，1930至1940年代，毛曾不止一次在重大問題上「違心地同意」斯大林，如1945年去重慶與蔣介石談判。根據蘇聯駐延安觀察員孫平（Peter Vladimirov）所見，毛澤東登上重慶的飛機時「一副要走上行刑台遭處決的神色」（頁346）。從《毛傳》沒有利用的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藏《蔣介石日記》看，這可以理解。蔣在重慶談判時的日記謂「共毛態度鬼怪，陰陽叵測，硬軟不定，綿裏藏針」，幾番欲下決心扣押毛澤東<sup>29</sup>。

1960年代初中蘇分裂後，蘇聯獲得的有關毛澤東的一手材料很少，《毛傳》有關晚年毛澤東的敘述也是最為薄弱的部分。作者對文革的解釋——文革不僅是毛澤東最後一次權力鬥爭，更是一次實現其烏托邦理想、創造一個新的理想社會的認真努力（頁7-8），也不新鮮。李澤厚的《中國現代思想史論》、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又譯麥克法夸爾）和沈邁克（Michael Schoenhals）合著的《毛澤東最後的革命》（*Mao's Last Revolution*），都有類似的論述<sup>30</sup>。《毛傳》對文革中毛活動的敘述，較多地採用了李志綏在《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中的說法<sup>31</sup>，同時也遺漏了毛的一些重要政治活動，如1973年八大

軍區司令員對調，1974年各大軍區司令員、政治委員會議（又稱「軍隊高幹會」），都隻字未提。此外，個別敘述不甚嚴謹，如賀龍「和林彪不和，他認為林彪在現代武器方面是個土包子。他就是因為這樣垮台的」（頁518），沒有註釋出處，也不符情理。

《毛傳》還提到，1960年代末蘇聯曾考慮對中國的工業重鎮或原子基地發動核攻擊（頁7），可惜沒有提供註釋出處。而對此問題，國際學界仍有爭議<sup>32</sup>。雖然1969年10月中蘇邊境談判前夕，總參二部報告說，蘇軍可能以談判為掩護進行核突襲，毛澤東也因此匆匆離開了北京<sup>33</sup>，但只是虛驚一場。此外，有關「林彪事件」的第三十五章「五七一工程疑雲」，沒有使用新史料，只是引用新聞報導說，克格勃從三叉戟飛機失事現場取下了林彪夫婦的頭顱帶回莫斯科作法醫檢查（頁553）。

#### 四 檔案的局限性

除了上面提到克格勃等更為敏感的檔案尚未公開外，也有論者指出，早在1920年代，蘇共政治局就規定：「有關極其重要問題的決定不寫入正式記要」<sup>34</sup>，一些敏感材料在留下來的檔案中並不是所在皆有。中共也是如此，檔案保存方面可能還不如蘇共。1980年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時，有關人員曾查閱中央檔案，起草小組負責人、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胡喬木11月6日致信鄧小平並轉政治局說，「『文化大革命』

正式文件很少，檔案也很不完全，建國以來中央會議很少紀錄，多數重要史實要靠調查核實」<sup>39</sup>。在中國，有行政級別愈高，可以看到的檔案密級也愈高的慣例。胡喬木作為中共黨史編纂工作的最高負責人，可以接觸到最核心的檔案，他的話反映了中央保存檔案的基本情況，也是研究者在考察相關問題時應加以留意的。

《毛傳》徵引的毛澤東1976年對王洪文、張春橋、江青等口述「我一生幹了兩件事」的「遺言」（頁571），以及1966年生日家宴向陳伯達、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等的祝酒辭「全國全面的內戰」（頁520），都沒有檔案根據<sup>40</sup>。後者出自上海市委書記徐景賢的回憶，是姚文元當時電話密告徐的<sup>41</sup>；最近披露的張春橋給女兒的信也追憶到毛說「為全面內戰乾杯」<sup>42</sup>，可為印證。前者主要源自葉劍英1976年8月至1979年9月向黨內高級幹部的多次轉述，但葉不是親歷者，又從未說明資料來源，引起了一些質疑<sup>43</sup>。1976年2月初，王洪文曾代表中央到病休的葉家，傳達毛關於華國鋒任代總理的決定，葉大感意外，王解釋說「這是暫時的」<sup>44</sup>。筆者推測，王很可能再向葉轉述毛此前的「遺言」談話，因「遺言」含有為這個出人意料的人事安排打招呼的考慮，不止自我評價生平而已<sup>45</sup>。毛去世後，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成了階下囚「四人幫」，一些敏感的檔案被銷毀<sup>46</sup>，以致史源不明。但是，這一類材料經鑒別後可以彌補檔案的不足，增進對毛的全面認識。

此外，《毛傳》關於朝鮮戰爭是斯大林事先算計好的把中國拖入與美國對抗的判斷，徵引了斯大林1950年8月27日給捷克總統哥特瓦爾德（Klement Gottwald）的電報（頁375）。在《毛傳》俄文版出版的同一年，中國歷史學家沈志華也發表了對這份電報的研究，其解讀完全不同，認為是斯大林事後的文過飾非，無從反映他在1950年初同意金日成發動戰爭統一北南朝鮮時的真實想法，並指出「如果研究者不加分析地完全相信檔案作者或當事人的說法，那麼就會掉入檔案作者有意無意設置的陷阱」<sup>47</sup>。筆者認為是言之有理的。《毛傳》引證檔案，有時對複雜的歷史背景似乎未有透徹分析，影響到相關敘述的客觀性。

胡喬木說，「『文化大革命』正式文件很少，檔案也很不完全」。在中國，有行政級別愈高，可以看到的檔案密級也愈高的慣例。胡喬木作為中共黨史編纂工作的最高負責人，他的話反映了中央保存檔案的基本情況。

## 五 兼談中譯本

本文初稿完成後，筆者看到台灣出版的《毛傳》中譯本，並在修改文章時用了其中的一些譯文。總體上看，中譯本全面、準確，對學界及一般中文讀者都是可貴的貢獻，但偶有瑕疵。這裏僅就翻閱所見，略陳一二。

《毛傳》緒論「神話與事實」最後一小段話，「總結而言，身為歷史學者，我們的職責不在責備或讚頌毛澤東」（頁8；中譯本頁30）之後的“*It is far too late to settle any scores with Mao. He is dead and answerable only, as he himself said, to Karl Marx*”（現在跟毛算賬已經為時過晚。他死了，唯一的答覆是——正如他自己所說——去見

《毛傳》大量使用了可靠性較高的俄國檔案，尤其是關於中年毛澤東的敘述，促使我們重新思考一些歷史問題。只是晚年毛澤東的原始資料，俄國沒有收藏，主要的檔案材料還有待中國方面的進一步開放。

馬克思了)未見於中譯本，但封皮註明該版本「一刀未剪」。筆者後來從與潘佐夫的通信中獲知，中譯本依據的簡裝英文本(2013年第二版)刪掉了這句話。但是，第二版「尾聲」中新加的一段話，“Mao was not like Hitler ... he was a Communist and as such he believed in class struggle and was indifferent to human sufferings” (毛不像希特勒……他是共產黨，篤信階級鬥爭而不顧惜人命)④，不知何故，中譯本也沒有譯出，版權頁也未有說明所據何本。

《毛傳》第二十四章「紅色麥加朝聖」敘述毛澤東第一次訪蘇，在列寧格勒參觀「阿芙樂爾號巡洋艦」(cruiser Aurora, 頁369)。中譯本將這艘曾在1917年11月7日(俄曆10月25日)晚向冬宮發射一枚禮炮空包彈、象徵「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⑤的著名戰艦譯為「郵輪『曙光號』」(中譯本，頁393)，偏離了「朝聖」的題義。此外，《毛傳》引用毛1976年元旦發表的《念奴嬌·鳥兒問答》，在中國大陸曾家喻戶曉。中譯本將其中的名句「土豆燒熟了，再加牛肉」譯為「土豆燒熟了，再添牛肉」，還有「借問君去何方？」譯為「借問你去何方？」(中譯本，頁523)。一字之差，詞韻頓失。毛澤東發表的詩詞不多，查核便易，譯文保持原貌為宜。

在中譯本中，還有一些毛澤東的原話，經中文、俄文、英文再回到中文的多次翻譯，出現特有風格流失的問題，如文革初在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語驚四座的「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譯為「現在在場的

就有牛鬼蛇神！」(中譯本，頁536)。這也是該譯本有待改善之處。

## 六 餘論

自《西行漫記》以來，關於毛澤東的傳記已為數可觀。但由於各種原因，尤其是史料的限制，對毛的認識還存在着偏差和距離。最近一本國際暢銷的毛澤東傳記，是2005年張戎夫婦合著的《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Mao: The Unknown Story*)⑥。《毛傳》的英文書名與之只有一字之差，應是有感而發，因為張戎夫婦的毛傳被批評為不夠真實，「一些見解，經不起嚴肅的質疑和考證」⑦。《毛傳》大量使用了可靠性較高的俄國檔案，故事講得更為真實，尤其是關於中年毛澤東的敘述，促使我們重新思考一些為人忽略的重要歷史問題。

比如，毛澤東中年事功極盛，有論者指出與他晚年展露的「造反有理」的浪漫欲求不同，中年時這些性格特徵被理知自覺地壓抑下去了⑧。而從《毛傳》看，這並不完全是「自覺」，還因為有「大老闆」罩着。斯大林死後，「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很快就「出了亂子」——1959至1961年的大災荒(即所謂三年「困難時期」)。赫魯曉夫雖然接了斯大林的職務，但被毛認為軟弱可欺(頁410)，連1961年主動提出借一百萬噸糧食給中國救災，都被毛一口回絕(頁474)。劉少奇1960年後看到餓死人太多，對毛稍有點違逆，毛就學着斯大林的口吻，當眾訓斥劉：「你有甚麼了不起，我動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把你打倒。」⑨

也許從這裏，還可以看到更真實的毛。只是晚年毛澤東的原始資料，俄國沒有收藏，主要的檔案材料還有待中國方面的進一步開放——期待那時會有更高質、全面、客觀、持平的毛澤東傳記問世。

### 註釋

① Александр Панцов, *Мао Цзэдун* (Москва: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2007).

② 潘佐夫(Alexander V. Pantsov)、梁思文(Steven I. Levine)著·林添貴譯：《毛澤東：真實的故事》(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5)。

③ 潘佐夫(Alexander V. Pantsov)著·卿文輝、崔海智、周益躍譯：《毛澤東傳》(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5)。

④⑤ 丁學良：〈經斯大林毛澤東理解現代中國——讀依據蘇俄檔案的新版毛澤東傳記(上)〉(2015年5月11日)·FT中文網·www.ftchinese.com/story/001061943?full=y。

⑥ Sergey Radchenko, "Mao: The Real Story by Alexander V. Pantsov (review)",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17, no. 2 (2015): 158-60.

⑦⑧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頁220；654。

⑨ Klaus Von Wiegrefe, ect, "Revolutionär Seiner Majestät", *Der Spiegel* 50 (2007): 35.

⑩ 何方：《黨史筆記——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下冊(香港：利文出版社，2005)，頁689。

⑪ 參見高華：〈對拙著《紅太陽》一書批評的總回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6期(2009年12月)，頁203。

⑫⑬ 師哲：《峰與谷——師哲回憶錄》(北京：紅旗出版社，1992)，頁89-90；239。

⑭ 鄧小平：《鄧小平文選(1975-1982)》(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頁257。

⑮ 趙家梁、張曉霽：《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崗在北京》(香港：大風出版社，2008)，頁44-45、262。

⑯⑰ Peter S. Deriabin and Joseph C. Evans, *Inside Stalin's Kremlin: An Eyewitness Account of Brutality, Duplicity, and Intrigue* (Washington, DC: Brassey's, 1998), 110.

⑱ 蒙克：〈蘇聯檔案解密(下)：還原真實的毛澤東〉(2015年7月7日)·BBC中文網·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a/2015/07/150707\_pantsov\_mao\_zedong\_archive2。

⑲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譯：《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1931-1937)》，第十三冊(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頁190-91。

⑳ Oleg V. Khlevniuk, *Stalin: New Biography of a Dictator*, trans. Nora S. Favorov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5), 289.

㉑ 中央專案審查小組：〈關於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罪行的審查報告〉(1968年10月13日)。參見宋永毅主編：《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1966-1976)》(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2006)。

㉒⑳ 參見吳法憲：《歲月艱難——吳法憲回憶錄》，下冊(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頁698；765-66。

㉓ 張秀山：《我的八十五年——從西北到東北》(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頁321；趙家梁、張曉霽：《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頁44。

㉔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五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頁309。

㉕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傳》，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1055-56。

⑳⑳ 〈給江青的信〉(1966年7月8日)，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十二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頁72；71。

㉑ CNN, *Cold War* (TV series), Episode 15, "China 1949-1972" (Atlanta, GA: CNN, 1998).

㉒ 參見楊天石：《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香港：三聯書店，2008)，頁439。

㉓ 參見李澤厚：《中國現代思想史論》(北京：東方出版社，1987)，頁192；Roderick MacFarquhar and Michael Schoenhals, *Mao's Last Revolution*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460。

㉔ Li Zhisui, *The Private Life of Chairman Mao: The Memoirs of Mao's Personal Physicia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4).

㉕ Lorenz M. Lüthi, "Restoring Chaos to History: Sino-Soviet-American Relations, 1969", *The China Quarterly*, no. 210 (June 2012): 390-94.

㉖ Edvard Radzinsky, *Stalin: The First In-depth Biography Based on Explosive New Documents from Russia's Secret Archives*, trans. H. T. Willetts (New York: Doubleday, 1996), 5.

㉗ 《胡喬木傳》編寫組編：《胡喬木書信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頁296。

㉘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六卷，頁649，註1；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下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頁1461。

㉙ 徐景賢：《十年一夢——前上海市委書記徐景賢文革回憶錄》(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3)，頁8。

㉚ 張春橋：《張春橋獄中家書》(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5)，頁128。

㉛ 李海文：〈毛澤東從未向華國鋒談過「血雨腥風」中交班〉，《黨史博覽》，2013年第3期，頁32-

33；〈關於毛澤東「一生幹了兩件事」談話〉，《世紀》，2014年第3期，頁16-19。

㉜ 熊蕾：〈1976年，華國鋒和葉劍英怎樣聯手的〉，《炎黃春秋》，2008年第10期，頁1-8。

㉝ 梁加農：〈哈佛大學館藏毛澤東「遺言」抄件跋〉，《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13年10月號，頁101-106。

㉞ 如1973年11至12月政治局擴大會議批評周恩來(「幫周會議」)的全部記錄被銷毀。參見高文謙：《晚年周恩來》(紐約：明鏡出版社，2003)，頁458；徐景賢：《文革名人徐景賢最後回憶》(香港：星克爾出版有限公司，2013)，頁296-307。

㉟ 沈志華：〈斯大林、毛澤東與朝鮮戰爭再議——根據俄國檔案文獻的最新證據〉，《史學集刊》，2007年第5期，頁51-65。

㊱ Alexander V. Pantsov with Steven I. Levine, *Mao: The Real Stor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3), 575.

㊲ 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1949年6月30日)，載《毛澤東選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頁1476。

㊳ Jung Chang and Jon Halliday, *Mao: The Unknown Story* (London: Jonathan Cape, 2005).

㊴ 陳永發：〈Jung Chang and Jon Halliday, *Mao: The Unknown Story*〉，《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2期(2006年6月)，頁211-20。

㊵ 李澤厚：《中國現代思想史論》，頁193。

㊶ 參見劉源、何家棟：〈「四清」疑團〉，載郭家寬編：《你所不知道的劉少奇》(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頁118。

梁加農 加拿大麥格納公司工程師，原中國浙江絲綢工學院絲綢史研究室副主任。